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中世纪哲学

〔法〕阿兰·德利贝拉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中 世 纪 哲 学

〔法〕阿兰·德利贝拉 著

姜志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哲学/(法)德利贝拉著;姜志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3214-8

I. 中… II. ①德… ②姜… III. 中世纪哲学—西方
国家IV. B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71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我知道什么?

中 世 纪 哲 学

[法]阿兰·德利贝拉 著

姜志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7-100-03214-8/B·484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32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5

定价:7.50 元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

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世纪哲学文献	6
一 著作和译本	6
1. 希腊哲学著作	6
2. 阿拉伯和犹太哲学著作(A. 阿拉伯来源; B. 犹太来源)	15
二 文学的种类和知识的形式	22
1. 教育领域:从学校到大学	22
2. 表述的种类:从注释到大全(A. 注解和注释; B. 提问和独白; C. 大全和小型大全) ...	27
第二章 逻辑学	34
一 从哲学著作中的逻辑到逻辑的科学 ...	34
1. 著作的构成和逻辑学的分类	35
2. “大全著作”的形式	36
二 中世纪词项语义学的伟大阶段	39
1. 波爱修的语义学(A. “是什么”和“为什么”; B. “指代”的诞生)	40
2. “逻辑大全”的语义学(A. 牛津与巴黎的对立;	

	B. “指代式”; C. 分析的方法; D. 非范畴项的特性)	41
三	中世纪逻辑的主要创新	47
	1. 从论题的论证到推论的理论	48
	2. 从诡辩到悖论(A. 义务辩论; B. “不可解问题”)	49
第三章	物理学	55
一	从宇宙起源论到物理学	55
	1. 柏拉图主义, 注释和阿拉伯科学	55
	2. 光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	58
	3. 运动的物理学	60
二	计算的时代	65
	1. 14 世纪的科学革命	65
	2. 物理学的数学化和“根据想象”的推理	68
第四章	形而上学	73
一	存在的问题	74
	1. 波爱修和“希腊—拉丁的”形而上学	74
	2. 阿拉伯哲学和“逍遥学派的”形而上学的诞生	76
	3. 作为“与物质分离的现实事物”的科学的形而上学	81
	4. 形而上学的“唯名论”概念	84

二	中世纪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大主题 …	87
1.	存在和本质 ……………	87
2.	存在的类比 ……………	98
3.	在存在之外;形而上学和太一论 ……	103
第五章	心理学和伦理学……………	108
一	思维的主体……………	109
1.	心理学的对象和定义 ……………	111
2.	灵魂的结构和机能(A. 机能的理论和大脑定 位; B. 认识的起源和理智的超验性; C. 从 心理学到“神秘主义”) ……	113
二	思维的对象……………	125
三	伦理学的用途和思维的目的……………	135
注释	……………	138
参考书目	……………	141

前 言

中世纪哲学错综复杂，维系于几个世纪中的史学传统，禁锢于由相互矛盾的激情而造成的冲突、孤注一掷和分裂之中，故始终不能完全摆脱中世纪哲学的维护者及其反对者所编织的意象和偏见。

中世纪，有人宣称它是教会精神权威的理想时代，有人则认为它是漫长的、痛苦的思想牺牲品的黑暗年代；有人把它粉饰成永远闪耀着光辉、值得追求的暧昧的排场，有人则痛斥它是“蒙昧主义”无知的最明显表现。这一千年间的思考、探索、革新和辛劳沉睡在平静的王位空缺期，这一王位空缺期划分了古代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所谓的“古典”时期所形成的未必确定的界限。中世纪的十个世纪，或者说十个世纪的过渡时期，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彼特拉克、路德和笛卡尔之间一个无止境的圆括弧，在这个“中间的”，“居间的”世纪中，“教皇”和“教会圣师”的“权威”占绝对优势，信仰战胜了理性，语言战胜了经验，抽象战胜了具体，词语战胜了物体。

那么，中世纪的哲学史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呢？它在这个位置上的时间太长了些，但已经开始在撤离这一个位置，一本正经的《大全》制作者在竭尽全力维护旧事物的同时，也预见到了新事物，“伽利略的先驱者”帮助“激进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信徒”加入到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进行着的圆圈舞行列中。

读者将阅读的这本小书只有一个奢望：在思想观念的领域里为“另一个中世纪”辩护。在此，我们并不自诩做到了客观和面面俱到，我们只想对最近的研究作一个总结，提出一些也许显得仓促的观点，把未知的事实考虑进去，简言之，把各种事物和人物放在其应有的位置上来考虑。我们所叙述的中世纪还不知道“经院哲学”，“神秘主义”和“哲学”之间的现代区分；在中世纪，思想观念的运动还没有与精神生活的结构分离开来；思想的节奏遵循着翻译的步伐，并表现出自身的节律；中世纪的思想家也是在限定的世界中进行阅读、写作和讲授的活生生的人。这种选择意味着一种方法。现在让我们来描述这种方法。

在此，我们反对把“学者”放在模糊的“世纪”或“时期”之上：着手的角度是主题的和学科的。

这并不是说年代不重要，而是应该在整体上考

虑年代。有些年份本身就能说明问题,年份上的接近决不会令人吃惊。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是古代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界限:奥古斯丁(Augustin)在奥林匹克竞技会取消(394年)后的两年(396年)写了《忏悔录》;普罗克洛斯(Proclus)死于〈匈奴王〉阿提拉在卡塔洛尼平原败北(451年)后的三十多年(485年),也在汪达尔人洗劫罗马(455年)和废黜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476年)之后;归之于“阿雷奥帕古斯的丢尼修”(Denys de l'Aréopage)的《著作》(Corpus, 约500年)在克洛维⁽¹⁾受洗礼(496年)后的几年写成;波爱修(Boèce),哥德·泰奥多里克神父死(524年)后五年,及蒙卡桑(Mont-Cassin)修道院创建(530年)的前一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en)关闭了雅典的最后一个哲学学校(529年)。同样令中世纪阿拉伯哲学文献研究者感到异常惊讶的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大注释家法拉比(al-Fārābī, 950年)死于于格·卡佩(Hugues Capet)开始统治前的三十年;阿维森纳(Avicenne, 1037年)死后的二十年,东西方基督教教会发生了大分裂;加扎利(al-Ghazālī, 1111年)正好是坎特伯雷的圣安塞姆(Saint Anselme de Cantorbéry)的同时代人,而阿威罗伊(Averroès, 1198年)则是菲奥雷的约阿希姆⁽²⁾(Joachim de Fiore, 1202年)和《布拉诺诗集》

(Carmina Burana)的同时代人。

然而,我们在比较这些年份的时候,却不能有所理解。所以,我们最好要根据哲学的主题、难题和问题,而不是根据人物及其昙花一现的命运来引起时间的连续感,并在思想来源的传播、推理形式的完善和学问建立的沿革之中来比较思想观念和概念上的连续性和中断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引线:研究创始人的著作,研究社会环境,然后根据学科——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伦理学——来进行哲学的分析。这种设想可能受到非议,但我们希望在展开它们时能说明其理由。尽管如此,我们要指出应加以说明的地方。扼要地说,首先应该摒弃两种错误的论点:第一个论点是我们在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著作中读到的,认为根本没有中世纪哲学,在整个中世纪只有神学;第二个论点是我们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著作中找到的,主张中世纪哲学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源于犹太-基督教的表达方式”这两者汇合的结果。

关于罗素的论点,我们可以给出各种各样较为温和的表达形式,比如说,中世纪的哲学并不独立地存在,它完全和绝对地隶属于神学,或者说,在中世纪不存在人们在谈论“希腊哲学家”时那种精神和社会意义上的哲学家。人们也可以说,哲学只不过是

基督徒用来更好地理解基督教自身的特殊性,或更确切地说,宣扬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文化事实,一个过去的象征。在我们看来,中世纪哲学的这些特点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至少有一点是错误的。参考时期(*la période de référence*)的长期性,知识界的混杂性以及神学观点的多样性不允许我们谈论中世纪哲学的某个问题或某个方面。海德格尔的论点的错误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同样能加以驳斥。事实上,真正地认识亚里士多德是很晚的事情,大约始于“中世纪”开始后的五个世纪,拉丁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latinus*)在构成上并不是纯粹的:我们敢说,逍遥学派化的亚里士多德,阿拉伯注释家的亚里士多德限定了、扩展了或压缩了拉丁的亚里士多德。

因此,与其重新采纳传统的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立,还不如把研究的主题放在希腊、古叙利亚、犹太、阿拉伯、拉丁的多重历史上和不间断的相互作用上,在这段历史中,一门学科的进展导致另一门学科的进展,各种问题相互变换、重组,并经常纠缠在一起。因此,当我们援引能揭示在标签、约定或标题后面的那个时代的实际特点和科学精神状态的材料时,我们就能说明中世纪学问的独特性:隐藏在各种各样的注释、文献和学说之下的潜在预先假设和解决的一致性。

第一章 中世纪哲学文献

一 著作和译本

1. 希腊哲学著作——西方的中世纪很晚才知道全部亚里士多德著作；当时实际上还完全不了解柏拉图。

在中世纪，柏拉图的最有名的著作是《蒂迈欧篇》的残篇(17a—53c)，由基督徒和新柏拉图主义者卡尔西底乌斯(Calcidius)在公元4世纪翻译和注释。意大利人亨利·阿里斯提普(Henri Aristipp, 约1156年)的《美诺篇》和《斐多篇》译本仅产生边缘的影响。莫依贝克的纪尧姆(Guillaume de Moerbeke)翻译的普罗克洛斯的《〈巴曼尼得斯篇〉注释》拉丁文译本，看来在莫斯堡的贝特霍尔德(Berthold de Moosburg, 约1350年)之前还未曾被引用过，之后，主要由库萨的尼古拉(Nicolas de Cues)引用。

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引入分为三个阶段。在1150—1160年之前，中世纪人只知道一小部分的亚

里士多德逻辑著作：由波菲利(Porphyre)的《引论》(Isagoge)补全的《范畴篇》和《解释篇》，即所谓的 *logica vetus* (旧逻辑)——波爱修的逻辑学专著补足了《工具论》的残缺部分。只是到了 12 世纪和 13 世纪初，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才见之于世：最初是波爱修的译本(《前分析篇》、《论题篇》、《辨谬篇》)和威尼斯的雅克(Jacques de Venise)的译本(《后分析篇》，约 1125—1150 年)中的《工具论》其余部分——即所谓的 *logica nova* (新逻辑)，然后是 *libri naturalis* (自然书)，主要是《物理学》、《论灵魂》、《论天》和《形而上学》。

众多的译本增加了理解原著的难度，造成了各种完整程度不相同、几乎都不一致的译本的共存，与现代文献学确定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相去甚远。比如，在 13 世纪中叶之前相继刊行于世的五个《形而上学》译本中，只有最后一个译本，即莫依贝克(1265—1272 年)的最新译本(*Novissima Translatio*)才与我们今天读的本子相符。第一个希腊—拉丁文译本，即威尼斯的雅克的最早译本(*Vetustissima Translatio*)及其匿名修订译本 *Composita* (著作)或 *Vetus* (旧著作)仅包括《形而上学》1—4 卷，止于 1007 a 31 中的一个句子的开头。第一个“全”译本 *Media* (无名氏译本，12 世纪末)不包括现代版本中

的第 11 卷(K 卷),仅由莫依贝克作序,其真实性非常可疑。这个译本把 L 卷当作第 11 卷。阿拉伯—拉丁文译本 Nova (米歇尔·司各特[Michel Scot])也缺少现代版本中的第 11 卷,它本身包括多个译本,用现代编号法表示:第 1 卷(= a),第 2 卷(= A^{5-10}),第 3—10 卷(= B—I),第 7 卷(= L^{1-10} 直至 1075 b 11)和第 1 卷(= $a + A^{5-8}$, 从 987 a 9 至 989 b 5),第 2 卷(= A^{8-10}),第 3—10 卷(= B—I),第 7 卷(= L^{1-10} 直至 1075 b 11),并通常由 Composita 的 A 版本和 Media 的 M—N 卷补足。

此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包含了很多伪作和伪题词。引用得最多的是《论宇宙》,由西西里的尼古拉(Nicolas de Sicile, 1240 年前)及后来由墨西拿的巴特莱米(Barthélemy de Messine, 1258—1266 年)译自希腊文;大马士革的尼古拉(Nicolas de Damas)的《论植物》,由萨雷希尔的阿尔弗雷德(Alfred de Sareshel, 1200 年前)翻译;《与世隔绝的隐居》(Secretum secretorum)和《论健康的调理》(De regimine sanitatis)(前者的残篇)两篇均译自阿拉伯文,前者由的黎波里的菲利普(Philippe de Tripoli, 约 1243 年)翻译,后者由西班牙的让(Jean d'Espagne, 12 世纪后半叶)翻译;古斯塔·本·卢卡(Qustā b. Lūqā)的《论精神与灵魂的差异》(De

differentia spiritus et animae)主要由西班牙的让翻译;《好运书》(Liber de bona fortuna)(由《欧德谟伦理学》第7卷14和《大伦理学》第2卷8这两部分剪辑而成)看来是在13世纪译自希腊文;《问题集》(Problemata)和《面相学》(Phsionomia)由墨西拿的巴特莱米(约1256—1268年)译自希腊文;《论元素属性的原因》(De causis proprietatum elementorum)由克雷莫纳的杰拉德(Gérard de Crémone)翻译;《论理智》(De intelligentia)可能由威尼斯的雅克译自希腊文;《六原理书》(Liber VI principiorum)这本拉丁文著作根据大阿尔伯特(Albert le Grand)和普瓦捷的吉尔伯特(Gilbert de Poitiers)交替地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最著名的阿拉伯文的亚里士多德伪作是《亚里士多德论纯粹公正辩白书》(Liber Aristotelis de expositione bonitatis purae)或《正义书》(Liber de causis)。该书于9世纪在巴格达编撰而成,由克雷莫纳的杰拉德译成拉丁文,直至14和15世纪,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通常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最后神学表述。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d'Aquin)被认为是该书的第一个注释者,他认为该书是普罗克洛斯的《神学纲要》的改编。

除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世纪人不甚了解古